



No. 3 2009

总 第十一期

复旦大学 文史研究院学术通讯

Newslet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2009年7月29日，我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院就合作编撰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谈，合作编撰双方以及出版方代表参加了会议。



9月15日、29日，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第十二、十三场分别在报告厅举行，董少新副研究员、访问学者何俊教授作报告，并与会场师生交流讨论。



9月，葛兆光教授在美访问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与系主任韩明士（Robert Hymes）教授与商伟教授合影。

目 录

我院召开《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出版工作讨论会	2
《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文献目录	3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提要选刊	5
From Seclusion to Reopening: Reconsider the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9
葛兆光	
“经学与明清学术思想史”2009 暑期中国文化史研讨班议题	13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十二至十三）	
董少新 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	15
何 俊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16
新书介绍	18
外刊撷英	20
博士后论坛	
倭寇之乱下明代士人对日本的研究	24
古典文学形象的经典解读 ——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刘兰芝形象为例	25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第三批项目立项	26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职、访问研究人员招聘启事	28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2009.07—2009.09）	30

我院召开《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出版工作讨论会

2009年7月29日,我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就合作编撰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一事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双方围绕合作的诸多细节问题展开讨论协商,并达成共识。

早在今年五月,我院与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术院签署了在中国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的协议。随后,双方共同组成了编撰委员会,中方委员有葛兆光教授、周振鹤教授、贺圣遂社长,韩方委员有辛承云教授、陈在教教授、安大会教授等,并各设一名联络人以便随时沟通工作进展。同时,为确保出版工作顺利开展,双方商定于七月在复旦大学召开此次出版工作讨论会。本次讨论会除编委会委员和联系人参加之外,还特别邀请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及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参会,并提供建议,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韩结根两位编审也到会参与讨论。

经协商,双方就以下几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韩

国汉文燕行录选编》的选目,确定选取三十七种《燕行录》出版,合计约11000页。二是出版所需各种《燕行录》的底本,明确由东亚学术院负责挑选、提供尽可能完整、清晰的善本。三是为每一种《燕行录》撰写1500字左右的中文解题,此项工作由双方共同完成。四是编辑出版的日程,双方议定在2010年底前完成出版工作。最后,约定全书出版后,分别在上海与首尔召开新书发布会,并考虑届时举办有关《燕行录》的学术讨论会。

本次会议的召开,预示着《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的编撰出版工作进入实质操作阶段。相信通过中韩双方的共同努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够将一套高质量、高水平的《燕行录》史料呈现在广大中国研究者的面前,使学界能够更便捷地加以利用并开展有关研究。□

王鑫磊

《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文献目录

经过合作双方多次增补和校订,最终确定三十七种韩国汉文燕行录,从《燕行录全集》、《燕行录选集》、《燕行录选集补遗》中选取,主要是 17 至 19 世纪朝鲜李朝中后期燕行使节的记录,共计约一万一千页。

序 号	作 者	书 名	收 录 情 况	页 数
1	崔溥	《漂海录》	〈燕行录选集〉下,〈燕行录全集〉1	404
2	郑士龙	《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3	50
3	尹根寿	《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4	45
4	郑昆寿	《赴京日记》	〈燕行录全集〉4	41
5	赵宪	《朝天日记》	〈燕行录全集〉5	284
6	许紬	《荷谷先生朝天记》	〈燕行录选集〉上	400
7	金湜	《槎行录》	〈燕行录全集〉10	42
8	李廷龟	《戊戌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10	86
9		《甲辰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11	56
10		《丙辰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11	18
11		《庚申燕行录》	〈燕行录全集〉11	72
12		《庚申朝天纪事》	〈燕行录全集〉11	26
13		《庚申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11	54
14	李民咸	《朝天录》	〈燕行录全集〉14、15	388
15	金埴	《朝天日记》	〈燕行录选集〉上	120



续表

序 号	作 者	书 名	收 录 情 况	页 数
16	李沂	《燕途纪行》	〈燕行录全集〉22	213
17	闵鼎重	《老峰燕行录》	〈燕行录全集〉22	99
18	金昌业	《老稼斋燕行日记》	〈燕行录全集〉34	161
19	闵镇远	《燕行录》	〈燕行录选集〉下	160
20	李宜显	《庚子燕行杂识》	〈燕行录选集〉下	164
21	洪大容	《湛轩燕记》	〈燕行录选集〉上	800
22	李 ■	《燕行纪事》	〈燕行录选集〉下	552
23	李德懋	《入燕记》	〈燕行录全集〉57	157
24	卢以渐	《随槎录》	〈燕行录全集〉41	166
25	朴趾源	《热河日记》	〈燕行录全集〉53、54	886
26	徐浩修	《热河纪游》	〈燕行录全集〉51	484
27	柳得恭	《燕台再游录》	〈燕行录全集〉60	69
28	朴思浩	《心田稿,燕行杂著》	〈燕行录选集〉上	392
29	崔暉	《朝天日录》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360
30	郑斗源	《朝天记地图》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160
31	李器之	《一庵燕记》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784
32	李健命	《寒圃斋使行日记》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120
33	李商凤	《北辕录》	〈燕行录选集补遗〉上	912
34	白景炫	《燕行录》	〈燕行录选集补遗〉中	220
35	徐长辅	《蓟山纪程》	〈燕行录选集〉上、〈燕行录全集〉66	600
36	金景善	《燕辕直指》	〈燕行录选集〉上、〈燕行录全集〉70	1 028
37	金允植	《领选日记》	〈燕行录选集补遗〉中	400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提要选刊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的合作项目,项目成果将汇集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越南历朝出使或北行中国的燕行录、北使诗文等相关文献,各附提要一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目前全部文献的扫描、排序工作已经结束,由复旦大学方面负责的文献提要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兹选刊《北使通录》、《轺轩丛笔》、《郿川使程诗集》、《如燕驿程奏草》四种燕行文献的提要,祈请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予以批评指正。

北使通录

后黎朝·黎贵惇 撰

《北使通录》四卷,存二卷,越南汉喃研究院藏阮朝钞本,两册,编号 A179。

黎贵惇(1726—1784),字允厚,号桂堂,太平延河人,十六岁中解元,后黎朝景兴十三年(1752)登壬申科第一甲进士第二名。景兴二十一年(1760),由翰林院侍读奉充副使出使中国,赐爵颖城伯。回国后,升翰林承旨,转海阳道督同。因妻亡子幼,上疏归田。景兴二十八年(1767)被荐还朝,历任户部右侍郎兼金都御史、吏部右侍郎、户部侍郎兼行都御史、左校点权府事等职。景兴四十二年(1781)因谗贬降,次年出叶艺安镇。去世后追赠工部尚书、颖郡公。平生著述甚丰,除本书外,尚有《易肤丛说》、《春秋略说》、《书经衍义》、《黎朝通史》、《抚边杂录》、《芸台类语》、《大越通史》、《黎朝功臣列传》、《圣模贤范录》、《群书考辨》、《见闻小录》、《桂堂文集》、《桂堂诗集》及《全越诗录》、《皇

越文海》等。

《北史通录》的主体,是黎贵惇于清乾隆二十五至二十七年(越南后黎朝景兴二十一至二十三年,1760—1762)以甲副使身份出使中国期间所撰日记体随笔,同时也包括了前此为出使作准备期间的相关记录。卷首有著者景兴二十四年癸未(1763)所撰“序”和景兴四十一年庚子(1780)所撰“题辞”。序中云“《北史通录》四卷”,而上册卷端题“北史通录卷之一”,下册卷端题“北使通录卷之四”,实际仅存首末两卷,故此抄本两册内封书名下,分别改题为“卷上”、“卷下”。

本书内容包括“政府奏启咨移传报诸文书,行送山川道里风俗诸事迹,柬札往复,礼文交际,祈祷犒赏,话谈应对,与上国咨报公文”(卷首“题辞”中语)等,绝大部分为汉文记录,间有若干喃文上奏。卷一记录从后黎朝景兴十九年(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至次



年十二月间北使出发前所涉各事,包括越方按成例准备贡使礼物、选派使臣、加官封赏、注意事项、准许通行等各种文书公告。卷四记载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二十六日起至次年正月初七,黎贵惇一行从江南省芜湖附近沿长江到湖广粤西一路南下归国途中每日行程,及与清朝地方官员交接唱和事宜与祭告山川古迹圣贤名人等事。其乾隆二十五年(1760)春从越南出发北上至京畿,完成贡使任务后又从京城南下,直到次年六月到达江南,这段时间内的相关记录,本应载于卷二、卷三两卷,惜已缺失。

正如本书序中所说,“是录中于塘汛道里、山川风景、衙署联额、官僚问对为详核”。其中如承越南国王之命,走访前此越南使臣从未一赴的北京国子监,详细记录其内孔庙规制,并购买带有附图的《阙里志》,以备仿制,如返程途中在广西和中国地方官员笔谈中越

历史地理等,均从不同的角度显现了中越两国历史文化渊源深厚。而记江南、湖北因大水而米贵,独湖南以外丰熟,黄州因岁考而书价颇贱,于了解乾隆年间地方实况也不无助益。至卷四开首至抵达长沙一段,屡记使程舟船因伴送钦差的管家勾结船主沿途贩卖私盐,致归程延滞,又从一个侧面映现出清朝吏治及社会的诸多问题。由于黎氏的记录详略、顺次均颇有序,从中可系统地了解乾隆时期官员接待外国使节的公文程序和礼仪风俗。其中越中两国关于贡使问题的公告、北使途中与清朝官员往来答复的文书、黎贵惇与清人谈诗论文之作(书内全文附录了清朝官员秦朝釭、朱培连为黎氏《群书考辨》和《圣谟贤范录》两书所撰序),更是为研究制度史、学术史和文学史提供了素材。□

王红霞

輶轩丛笔

阮朝·潘辉注 撰

《輶轩丛笔》不分卷,汉喃研究院藏钞本,一册,编号 A801。

原书未署作者姓名,汉喃研究院图书馆目录著录作者为裴文禔,王小盾等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同(第62页)。考裴文禔(1832—?)乃光绪二至三年(越南嗣德二十九至三十年,1876—1877)间出使中国,而《輶轩丛笔》只字未记道光以后事,且有“道光帝继统,又已六年于兹”、“今春秋始四十五”诸语。按道光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道光六年(1826)适四十五岁,是可证本书当为该年前后在华的越南使节之作。又书中“子产庙”、“洛河”两则作者分别录自撰五律、七绝一首,二诗均见于道光五至六年(1825—1826)使华副使潘辉注诗集《华轺吟录》(已收入本丛书),综合推考,本书作者当为潘辉注。

《輶轩丛笔》所载中国境内行程与历代越南使臣大致相同,自镇南关始,历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诸地。记述舟车

往返途经山川、城市、景物、里程、风土、人情、碑记,而记景物最为详尽。对于在北京所见朝聘燕享、驿舍园宅、衣冠服制也有翔实的记录。关于社会实态的文字并不多见,《华轺吟录》中反映的人事往来概不阑入。书中最后部分的分类部居,则已不严格遵照行程次序。

作为外来使臣,作者记录清廷见闻的视角与一般的域内时人相异。如“道光帝殊有勇略”一则谓之“然今春秋始四十五,而齿已尽落,殊属异事,询之内务府所,云帝为诸王时,射弩偶伤缺齿。嘉庆二十三年待钓于太湖,得异鱼不知名,欲食,仁宗谕曰:鱼不知名,不可食也。帝潜令烹煮,一日夜方熟,取而尝之,是夜梦神人来取鱼龙,醒起,齿尽落。此是目击耳闻之说,而理似不可解”。“夜梦神人”云云,作者并未信从,不过道光帝中年缺齿,当时臣下恐无敢入诸文字者。

对于同一情形来贡的他国使者,作者也相当关切,表达了文化接触的兴味:“闻有朝鲜使来,遭风反飘在山东,约十日旬,不及与见。回忆先辈与伊国使唱酬,



传为佳话,旨获再续为雅游,殊阙事也。”

本书记燕京八景,云“今使者获见唯太液、琼岛、芦沟三景耳,余非经过之处,姑志其略以备考”。从现存内容看,未有此类说明的如“北国五岳”之属也不全然为亲见实录,所录多有从地志和前人著述中抄撮者,因此书中有关地理沿革、史迹风景的内容为多,一再引述前此越南先辈使节诗文,但明确称引者仅清人闵述《粤

述》、清人所编丛书《说铃》二种。其于清先代发迹史事,从官书史录中摘抄一千六百余字,与今存《通鉴辑览》文字相合。统观全书内容与文风,当属于行经之后追记,故记录同一使程,与同一作者所撰《华韶吟录》在史实细节上不无异同。□

王 亮

郿川使程诗集

阮朝·范芝香 撰

《郿川使程诗集》不分卷,汉喃研究院藏钞本,一册,编号 A251。

范芝香(?—1871),字士南,号郿川,阮朝海阳省安眉县人。明命九年(1828)考中举人,历任知县、宁太总督、太原布政等官职。曾于绍治五年(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嗣德五年(清咸丰二年,1852)两次出使清朝。著作除本书外,尚有《南史私记》、《南天国语实录》等。

本诗集是范芝香道光二十五年(1845)首次出使清朝时留下的汉文记录。该次出使活动是一次例行的贺节使行,范芝香担任第一副使,正使是礼部侍郎张好合,第二副使是侍读学士王济齐。本册诗集共收录诗文百余篇,其中绝大多数为范芝香本人所作,也转录了一部分同行的张、王二氏及其在使行途中交流往来的清朝士人之作。这些诗文的体裁以五言、七言体为主,另有个别几篇四言体。此外,不少诗文附有题注,提供了一些诗文写作的背景资料。

综观本诗集所收录的诗文及题注,其反映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勾勒出该次出使活动的概况。比如,《勤政殿陛辞仰聆圣谕恭纪》反映受命出使情况,《过关书怀》、《江程书怀》、《过河喜赋》等记述了去程经历,《元旦太和殿早朝》反映使臣朝圣经过,而《回韶喜赋》、《抵关喜成》等则是返程情况的记录。同时,由于诗集收录的诗文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编排,文中又有大量明确的地名记载,因此从中可以大致勾画出当时越南使节

的出使路线图。此外,从《荣泽阻水留宿草屯坡》、《孟津再阻水》、《五险滩即事》等诗文中我们可看到当时出使路程的艰难;而从《紫光阁蒙赐宴赉恭纪》、《元宵后一日圆明园侍宴恭纪》等诗文中还可看到越南使节在清朝所受的礼遇。

二是再现古代中国山川风貌,反映越南使节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所收录的诗文中不仅有大量对沿途风景名胜的咏唱诗,如《桂林纪见》、《秦渠偶占》、《湘江夜泊》、《洞庭舒眺次韵》、《泛湖望岳阳楼》等,还有很多对古迹古人的感怀诗,如《题诸葛兵书岩》、《题岳武穆王庙二律》、《过毛遂故里》、《题偃师二程夫子书院》、《过魏武疑冢次韵》、《过殷太师比干墓》等。

三是记述使行过程中的人员交流互动。主要以越中两国相关人员诗文赠答唱和的形式表现出来,诗集中收录的诗文如《次韵答谢江州贾石堂》、《汉阳留别张次征举人》、《题怀庆太守汪孟慈清明栽藕图》、《题□契巴陵武秀才集后》、《长送泗城知府刘铭之大烈惠赠对联诗扇走笔答诗二律》等即是其例。值得一提的是,诗集中还收录了一篇《赠朝鲜书状李学士裕元题扇》,反映了范芝香与朝鲜王朝使团书状官李裕元相交的情况,可见当时这样一种朝觐使行活动,不仅是附属国与宗主国之间的交往,同时也是不同附属国之间人员交流的机会。□

王鑫磊



如燕驿程奏草

阮朝·阮文超 撰

《如燕驿程奏草》不分卷,收入汉喃研究院藏刻本《方亭文类》(编号 VHv. 839/1)乙集卷二。《方亭文类》共三卷,依次名为甲集卷一、乙集卷二、丙集卷三。其中乙集卷二又分“册制表疏笺启类”、“如燕驿程奏草”两部分,仅此第二部分为燕行文献。

阮文超(1799—1867 或 1872),字逊班,号方亭,河内青池金缕乡人。明命六年(1825)举人,十九年(1838)中会试副榜。先后官翰林院侍讲学士、兴安按察使等职,并于嗣德二年(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如清乙副使一职,出使清朝。其人著述颇丰,除本书外,尚有《方亭诗类》、《壁垣藻鉴》、《大越地輿全编》等。其中《方亭诗类》有《方亭万里集》一卷,所收皆阮氏使清途中所撰诗,可与本集参看。

本集共收文二十七篇,皆道光二十九年(1849)阮文超使清途中所撰之文。此番出使,系阮翼宗登基后首次岁贡,同行者尚有正使礼部右侍郎潘靖、甲副使鸿胪寺卿枚德常。此行历经广西、湖南、湖北、河南、直隶五省二十余府,皆由水路进发。八月抵北京,按例进献贡礼后,旋即南返,并于次年初春回到越南。又据集前作者自序,可知行前翼宗曾命其详记沿途江山胜概。故此书实为阮氏返回越南之后,向翼宗进呈的奏章,因总名“奏草”。

此集前二十篇依次选择沿途所经山川险胜之地,详细介绍其地理方位、周边形势、人文物产、历史沿革等具体情况。如有相关的人文掌故、历史传说,则以双行小字注出。注文广征中国历代史书、方志,可见作者对中国文化、文献均相当熟悉。值得一提的是,阮氏在拟定篇名时,多冠以“咽喉”、“要会”、“厄塞”这一类词

语,可见其所关注的山川,特点在地势险要,而非景色秀丽。因此,集中对沿途人文景观的介绍相对较少,即使如岳阳楼、黄鹤楼等游览胜地,也只是一笔带过。此外,所记各省情况,也有轻重详略之分。二十篇中,介绍广西境内山川的共有十一篇,最为具体详细。直隶次之,湖南最少。由此可知,此行考察的重点在中、越交界之地及京师,中途所经各省则略显次要。又第二十一篇《塘汛烽燧》则对广西至直隶沿途的军事制度“塘汛”作了一定的描述。其后六篇,包括祭马伏波庙文、祭洞庭庙文、申告岳州湖神文各一篇,广西、湖北辞行小启各一篇,湖北辞宴文一篇。这些文字篇幅相对较短,但也反映了越南使节在中国的相关活动,及其与清朝接待官员之间的往来情况。

又综览全集,阮文超记载之重点,在于沿途山川概况;而于山川之中,又尤其注重对各水系的介绍和考察。凡涉及河流之处,作者均详细标注其源头走向、流域范围,偶尔还会作一些简单考订。这应当与此行全系水路有关,但也反映了阮文超个人的兴趣所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江汉要会》、《黄河津要》二文,言及对清朝河防水利建设的考察和看法。考阮文超《方亭文类》卷二有《筹拟河防事宜疏》一文,其中涉及中、越边境众多河流情况,并以较大篇幅讨论了中国治理黄河等河流的得失经验。此疏作于嗣德五年(1852)前后,正为文超使清归来后不久。可见此次使清,原即有考察河流水利的目的。□

郑 幸

From Seclusion to Reopening:

Reconsider the Three East Asian Countries

 葛兆光

这是葛兆光教授在2009年日本关西大学举行的东亚文化交涉学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也是他的学术论文《十九世纪初面对西洋之东亚——黄嗣永帛书的风波》(Korea, Japan and China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facing religions from the West: on the Lettre D' Alexandre Houng a L' éréque de Pekin)的结语部分,主要提出他本人对于“冲击—反应”模式的重新评价、如何理解各有各的反应、以及东海作为历史世界等三个问题的思考,在会上得到哈佛大学入江昭教授、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等各方学者的回应,现发表于此,希望引起讨论。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Joseon Dynasty of Korea and the Great Qing Empire all chose to close their doors, in terms of both territory and ideology, against western missionaries. When confronted with Catholicism, coming afar from the mysterious western world and were supposed to bear certain intentions, they demonstrated the greatest hostility ever seen. The next century witnessed the opium wars of Qing Empire, the black ships incident of Japan and Ganghwa Island incident of Joseon dynasty. These historical events had probably forced them to re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This paper does not intend to trace this history, but to examine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through the various strategies they had taken toward Catholicism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uch attitude had more or less influenced their later responses to western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even choices of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Why did they differ in attitude and strategy when

dealing with the western religion? What contributed to these differences? To resolve these issues calls for detailed historical research that goes beyond this paper. However, inspired by the historical phenomena we have hitherto discussed, I would like to conclude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ree questions.

First, how should we judge the “impact-response” model i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history?

As is known to all, John K. Fairbank and Deng Siyu proposed the “impact-response” model in their co-authored boo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in order to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The model was extended from the narrative of China to that of the whole East Asia both in the book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by John K. Fairbank et al (1965), and *Far East: A History of Western Impacts and Eastern Responses (1830-1965)* by Paul H. Clyde and Burton F. Beers (1966). From then on, it had almost become a paradigm in explain-



n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American scholar Paul A. Cohen had criticized the model sharply in his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He held the opinion that we should “discover history inside China”, and that the origin of modern history as well as resources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s should be sought from within China or the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Cohen had certainly promoted a shift of paradigm and aroused multiple response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However, the “impact-response” model, simple as it may be, turned out to be a concise, yet quite inclusive model for interpreting the universal historical phenomena in modern East Asian history.

The problem is, how should we revise and complement the seemingly simplistic model? The different strategies (or responses) taken by Japan, China and Korea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western religion (the impac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s discussed above, may well serve as an illustration of how responses to the same “impact” could differ, due to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differences. Asia or East Asia should not be seen as one, when we take into account first the above-mentioned differences, then further divergences in the cognition of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outside world, finally different ways and progress of modernization. Should we appreciate the “diversity of responses” to foreign civilizations? This paper intends to discuss the issue through a survey of the diverse strategies and attitudes Korea, Japan and China took toward the western religio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Second, if we acknowledge the variety of “responses”, we still need to ask, what factors had led to the differences.

This is another broad topic. But in brief, there were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aspects. To begin with, Japan, Korea and China had distinct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mid- and late 16th century when western missionaries arrived, neither did Japan have a powerful monarchy as in China, nor was it dominated by Confucianism or any unified political ideology. In Japan, feudal lords in different

regions could provide protection to foreign religions, while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re also at liberty to support new faiths. Therefore, there was warm “acceptance” of foreign religions in Japan. However, the other way round, Catholicism arrived in Japan at a time when Japan was going through a transition from political chaos to unification, and from ideological diversity to concentration. After Oda Nobunaga, the rule under Toyotomi Hideyoshi and Tokugawa Ieyasu, appeale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entral authority in a reunified country, and it had been on full alert for any dissident notions or beliefs. Every possible precaution, however ruthless, was readily taken.

Besides, compared to China, Japan never had a social structure dominated by the scholarly gentry who usually gained power through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Neither had it formed a national ideology based on the “Confucian rationalism”. Though it had tried to emulate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Ritsuryō), its national ideology had always been centered on “religion” and “samurai”. That was why its attitude to Catholicism had swung constantly from “tolerance” to “exclusion”, until the final stop at “exclusion” w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ity gained momentum in the early stage of Tokugawa Shogunate. In the turn of 18th and 19th century, a Japanese version of sinocentrism gradually took shape in the shadow of the East (China) and the West (mostly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Japan attempted to establish a nation state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Shinto and Emperor worship. So it was highly sensitive toward western religion and adopted extra rigid prohibitions. On the contrary, China, always indulged in an arrogant self-image of “Celestial Empire” and the firm belief in Confucianism, though with proper adjustments, its imperial court and the scholarly gentry showed neither anxiety nor passion over western religions. Eve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when Jiaqing Emperor imposed a harsh ban on Catholicism, the imperial court was much less anxious as Japan and Korea. The same uncon-



cern also marked the scholarly gentry's attitude toward the new faith and learning. While in Korea, knowledge and thoughts were under the monopoly of Yangban officials. Its entrenched traditions and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ideology had resulted in the inheriting of political notions and philosophical beliefs from Confucianism sinc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the school of Zhu Xi. Nevertheless, Korea's overreaction to the western religion was triggered by the collusion between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Korean Catholics, and its role in factionalism and court politics.

Then,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in the three countries was another factor to consider. The prohibition of Catholicism in the Qing Empire was led by imperial, or rather, political power, under the motivation to protect the imperial power and sovereignty. Buddhism and Taoism, the two indigenous religions that were supposed to have clashed with Catholicism, however, played little role. In other words, the collision with foreign religions in China was political rather than religious, which signifies the mightiness of political power as compared to the feeble religious beliefs in Qing Empire. In Korea, the prohibition on Catholicism in Joseon Dynasty was not merely a result of political movement and factional intervention. Its political ideology of Confucianism, especially Cheng-Zhu's Neo-Confucianism, had also played a role in the official extirpation of Catholicism, making the event more of a conflict between different ideologies or beliefs. In Japan,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Buddhism and Shinto had greatly influenced the attitude of rulers such as Toyotomi Hideyoshi toward Catholicism, i. e., from reception to expulsion. Consequently, there was plenty of discourse guarding Buddhism and Shinto in the prohibition order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instance, the first and second articles of "The Edict of Proscription (Toyotomi Hideyoshi)" had words suggesting religious beliefs as, "Japan worships Shintoism. The practise of Catholicism is most weird." and "It is unheard-of that Japanese Catholics damaged and abandoned Shinto shrines and Buddhist temples". A common

attitude among officials was that, "Religious beliefs had always been in good order in Japan with the prosperity of Shinto,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yet ever since the intrusion of the new religion,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evil." As was mentioned above, the Emperor, shoguns, Buddhists and Shintoists in Tokugawa Shogunate were unanimously afraid of foreign religions. This will of the state combined with religious exclusion, made the Japanese prohibition of Catholicism the most thorough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Finally, how should we redefine the regional history of East Asian maritime world, namely, China, Japan and Korea? And what kind of paradigmatic significance can thus be derived?

Recently, in the preface to his new book, professor Zhang Guangda has referred to the Mediterranean studies of the French historian Fernand Braudel (1902-1985),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Annales School. This book, entitle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focused the discuss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during the years between 1551 and 1589. The Mediterranean had always been a complex of races, religions and politic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gyptian, Assyrian, Persian, Greek and Roman, the religious clash among Judaism, Catholicism and Islam, and the dominance of maritime transport over a long time, combined to shape an interrelated "historical world" or "cultural space" encircling the Mediterranean Sea. It was in this particular arena that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panish Empire and other nations had once interacted with and impacted upon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professor Zhang, the Ancient Western Regions in central Asia was also a junction of religions, beliefs and cultures. In terms of religion alon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of the Han nationality China, Buddhism of the South Asian India, the Three Alien Religions (i. e. Nestorianism, Zoroastrianism and Manicheism) of East Asia and even Europe had all left traces here. This



made the Ancient Western Regions in fact another “Mediterranean”.

When examining the intricate cultural history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I agree with Professor Zhang that the Ancient Western Regions, or the left wing of China before the Mongol-led Yuan Dynasty, was indeed a “Mediterranean” of religious, lingual and historical interactions. The civilization of Han nationality mixed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constructed an extremely complex space of culture. However, after Yuan Dynasty, the East Asian maritime world, or, the east wing of China, was what I suppose a more noteworthy “Mediterranean”. Because either in the

Mediterranean or in the Ancient Western Regions, cultural varieties had gradually melted into similarity. Yet in the East Sea area, the once common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had diverged into separate cultures in Korea, Japan and China. Later,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it had taken in western influences, making this space of culture even harder to define and predict. Perhaps, the overlapping historical images of this cultural area could not only help us to discover more stories beyond national boundaries, but also add a new model to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with its heterogeneity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

“经学与明清学术思想史”

2009 暑期中国文化史研讨班议题

Classical Learning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1600-1900

Seminars and Lectur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summer 2009

2009 年暑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 (Benjamin A. Elman) 教授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历史系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举办“经学与明清学术思想史”研讨班,重点在介绍当代欧美学界对宋元明清经学史的研究,并讨论如何从士人菁英以及大众文化的视角,对前近代中国进行研究,以及如何对儒学、新儒学领域的既有认识进行批判性思考。艾尔曼教授是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本次研讨班的主要议题如下:

1. 中国思想史的新方向。主要讨论文化史的范围和核心议题,从当代出现的情境分析、结构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史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史方法 (history of ideas approach)。讨论的问题包括,史华慈 (Benjamin Schwartz) 和狄百瑞 (William T. De Bary) 关于宋代儒学本质和意义的探讨,异同点何在? 倪德卫 (David S. Nivison) 如何看待两宋以来中国科举考试的多重文化意义? 这些既有论述能否让我们形成儒学史的连贯图景? 还是说,这些文献仅提供了零碎的图像,让人依然对两宋思想史充满疑义?

2. 新儒学 (Neo-Confucianism)。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北宋真宗朝至南宋理宗朝 (约 1000 至 1250 年) 之间复杂的思潮有何帮助? 又有何局限性? Thomas A.

Wilson 一文如何助于厘清儒学在元明两朝的演变? 按照伊懋可 (Mark Elvin) 的说法,为什么妇女守节会受到国家表彰? 这种表彰是如何进行的? 对于妇女殉节的利用,体现了“性别意识形态”哪个方面的内容? “儒学”或“新儒学”的内涵是什么? 如何将中国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结构来探讨,分析学界以“新儒家思想” (Neo-Confucianism thought) 指代宋以降文化史的作用和局限。狄百瑞早期使用“Neo-Confucianism”一词来概括两宋思想史,这与刘子健以及海格尔 (John W. Haeger) 在叙述新儒学兴起时所使用的同一概念,内涵上有何不同?

3. 儒学与科举考试。菁英教育,本质上是文化的再生产,而同时也是外在的社会、政治再生产过程,这一认识有助于从教育的角度,在中国文化的长期演化中理解儒学。那么,如何评价宋代至清代科举考试的演变? 为何宋元时期出现儒士改行从医的现象? 反过来,医生能成为儒士吗? 中国士大夫如何进行“社会再生产”? “再生产”这一模型在解释儒学的历史发展时,有何优点与不足? 如何考察儒学教育及科举考试这些文化因素在前近代 (pre-modern) 中国社会中起到的作用? 专制制度下,士大夫如何维护儒学/新儒学的国家正统地位,对此,牟复礼 (Frederick W. Mote) 与贺凯 (Charles O. Hucker) 各持何种观点?



4. 帝制中国的新儒学和专制。主要探讨元明时期新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它如何在儒学的整体框架下运作,又如何维护专制制度。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一文对于进一步理解儒学/新儒学思想得出什么结论?新儒学的思想体系在明帝国初期对于强化专制统治起到何种作用?艾尔曼关于科举一文,如何说明15世纪以后儒学在帝国晚期的作用?此时朝廷与官僚制度的关系是什么?新儒学既为士人提供了道德说词,另一方面又是专制统治之正统依据,那么,16至17世纪士人的抵触情绪和对业余精神的提倡,又应该如何理解?

5. 明朝的思想流派。主要关注15至16世纪出现的个人主义、平民主义以及其他批判思潮,并在专制制度的基础上讨论新儒学在以上思潮中的作用。以Paul J. Smith、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以及包筠雅(Cynthia Brokaw)的讨论为基础,如何考察宋以来商业的发展,以及晚明出版业的兴盛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这几位学者的研究对于理解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有何贡献?万志英对明朝财神的探讨,对于考察大众文化有何助益?当研究的视野从菁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时,是否需要修正先前对于儒学/新儒学的研究范畴和界限的估计?

6. 明清转型。在17世纪新思潮产生的背景下讨论明亡之后新儒学的影响。将儒学与新儒学两相对照,探讨这一时期的国家施政与考证学。在明清转型中,新儒学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何在?余英时对于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什么?在描述这一时期时,他为何使用“智识主义”与“反智论”这样

的词汇?盖博坚(Kent Guy)如何论述18世纪学者与国家的关系?他对于清代鼎盛时期及其学术工程(编纂四库提要)有何观点?

7. 欧洲科学与儒家学说。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带来欧洲科学,在此背景下,探讨考证学与清中叶科学复兴之间可能的联系。对比列文森和席文(Nathan Sivin)关于科学复兴的意义的论述,18世纪中国科学复兴的可能性有哪些?关于中国科学史的论争是否以及如何反映了儒学的弊端?在从宋学向汉学的过渡中,耶稣会士发挥了什么作用?

8. 帝制晚期的中华帝国。在近代中国主流思潮中重新审视清朝鼎盛时期的学术界。18世纪考证学家对思想界及社会有何影响?章学诚是不是其所处时代的一位典型学者?他反对袁枚和戴震的原因何在?

9. 19世纪早期的转型。探讨帝制与西方影响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考察历史变迁的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及其与儒学本身的转型之间的关联。1800年前后和坤案反映了乾嘉时期中国思想界怎样的变化?常州学派在18世纪晚期士人政治热情的重新高涨中起到了何种作用?

10. 帝制与近代化的问题。从列文森和周策纵对反儒学运动的论述中,是否可以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反映了与传统儒学/新儒学思想的断裂?或者,此次的阅读材料有没有指出一些重要的连续与传承?最后,讨论上述课题在中国近代文化史整体脉络中的关联。20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经典的废止陷入两难境地,对此,伊懋可的研究方法有何优缺点? □

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系列(十二至十三)

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

董少新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不同文献因其作者所秉持的立场不同,对同一历史人物有不同的型塑与评价,此乃史家常遇之现象。结合不同文献以恢复历史人物的原貌、给予其客观的评价,为史学家当然之职责。然而,或因史料搜罗未全,或因史家立场片面而对某些史料视而不见,从而导致历史人物形象失真,此类例子在学界亦屡见不鲜,对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1588—1657)的研究即为一例。

钱海岳《南明史》载永历朝太监张福祿、全为国临刑前曰:“我辈生不能诛(马)吉翔、(庞)天寿、可望三贼,死当作厉鬼杀之,以除国害。”钱氏因此对阉竖大加挞伐,认为宦官祸国乃明亡之重要原因。教会史家萧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云庞天寿“为明尽忠,誓死不二。永历用为司礼太监,多所匡救。”又云:“天寿奉教热心,辅相永历十二年,赤心忠肝,深为永历所倚赖。”

两位民国时期的史家对庞天寿之评价迥然各异,这主要因为他们的治史立场不同,其评判人物之标准,一在于效忠皇帝,一在于敬奉天主。此外,他们所使用的史料来源不同也是一个原因。冯承钧早已意识到中西文献记庞天寿事“毁誉不一”,西教士所记颇多称

誉,而若干南明史籍则多有微词,并认为安龙“十八先生案”乃是“后人不察,尽以(夏)国祥之罪归之天寿,而天寿遂蒙恶名矣”,教会史家方豪完全赞同冯氏的看法。

庞天寿为顺天府大兴人,崇祯朝为御马太监,农民军攻陷北京前不久,奉敕至南京,事弘光帝,管两广珠池。已而奉命前往福建、两广征税,随即闻南京已陷,遂事隆武帝,改任司礼监,而获重用。隆武帝希望通过耶稣会士从澳门获得西方军事援助,而天寿以教徒身份之便利,穿梭于帝与西士之间。隆武二年(1646)帝遣天寿偕毕方济往澳门求援,然途中已闻福京陷落,故转赴肇庆,带300葡兵事永历帝。

庞天寿跟随永历帝转战粤、桂、滇、黔,忠心耿耿,深为皇帝信任,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勇卫营,获赐一品服。但晚年因与马吉翔勾结,参与吴楚党争、弹杀林时望、谄事孙可望、威逼永历禅位、十八先生案、陷害高勛等一系列不忠行径而落得骂名。但西文文献和教会史论对这些事情不提只字。

庞天寿在1629年入教,教名亚基楼(Aquileo),是最早入教的太监之一。庞天寿奉教及其通过天主教人



脉网络为永历效力等事,中文文献仅有王夫之《永历实录》中略有记载,但对其做法颇不以为然。西文文献对庞天寿的记载,多侧重其奉教效忠一面。1640年代,随着北京陷落、南明诸朝相继建立,庞天寿在朝中的地位不断攀升,相应地其在教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164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福州登门拜见任司礼监的庞天寿后,称其为教会的柱石。

庞天寿不仅利用其与传教士的关系,再次赴澳门搬援兵,而且在他的劝导之下,永历朝的太后、皇后、皇子先后领洗入教,成为中国历史上天主教色彩最为浓厚的王朝。庞天寿又曾致函罗马教皇、耶稣会总长和葡萄牙国王,希望借助欧洲的力量解朱明王朝于困境之中。

西文文献所记庞天寿忠于永历、虔奉天主,虽大致不误,然天寿对天主教之信仰,如同对永历帝之忠诚一样,似亦并非始终如一,如他曾受朱容藩贿、贿赂孙可望部下郑国、纵容马吉翔以幼女送郑国为妾,表明他已不把教会戒律放在眼里。吴楚党争期间,与同为教徒的瞿式耜分属两党,“十八先生案”期间,为抓捕参与密敕事件的张福祿、全为国,怒斥同为教徒的太后和皇后,且欲废皇后,可见教友情谊对他而言已无所谓。

庞天寿历经明清鼎革之乱,又是奉教太监,要想客观地对其一生事迹加以评价,实非易事。本人试图抛开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预设立场,通过现存中西文献的综合研究,恢复庞天寿的历史面貌。□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

何俊 浙江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在现代学术界,余英时先生称得上“通儒”,他的研究涉及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与许多层面,其中思想史研究是余先生毕生最费心力,也是最具贡献的领域。思想史的研究领域极其宽广,即使以西方的术语来看,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学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的称谓虽然将思想史由专而博划分出三个层次,但由于彼此间的交叉重叠,加之三者本身各自蕴涵难定,因此,无论从哪个层面切入,思想史的观念仍存在着极大的模糊性。对此,余先生自早年起就有认识,他认同思想史家的全部工作必须涉及从抽象的哲学概念到人的具体活动之间的各个层面,并通过具体的专题研究进行实践上的探索,取得了众多的成就,同时也使得难以言诠的思想史观念逐渐清晰起来。

本报告通过梳理余先生在中国近世思想史这一自成单元的研究,来把握他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观念,以及学术思想,并呈现他关于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的认识,旨在凸现余先生在事实与价值、专精

与通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治史追求。

一、实证与诠释交互为用。余先生以为论世必尚外在之客观,故实证之法为不可废;知人必重内在之主观,故诠释之法亦不可少。而对于思想史的实际研究,实证与诠释则不可须臾相离,因为内外合一、主客交融正是思维之所由起。

二、观念的追溯与展开。举余先生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七个条目研究为例,将它们放置在从宋到清的学术思想史中加以展开,从而使得一个具体的观念分析,既折射出丰富的思想史内容,又使得观念本身获得充分的诠释。

三、内在理路。这一重要的研究路径直接缘起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余先生以为,传统的解释主要是从反满的角度与市民阶级的角度,究其实,都是从政治与经济等外在因素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这种解释虽然自有它的某些根据,但却从根本上忽略了思想史本身是有生命、有传统的。

四、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余先生固然肯定与坚



持“内在理路”的方法及其观念,但在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研究中,除了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采用“内在理路”外,其余的专题研究更多的是转移到外缘的领域。在处理外缘情境与思想流变时,余先生能取其宏大而尤重细微,依势传神而不拘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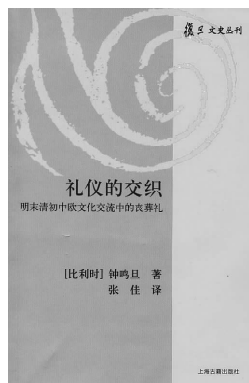
五、问题意识与两个世界。以具体案例讨论余先生如何产生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注重学术思想变迁自主性的“内在理路”,与强调学术思想变迁依他性的“外缘情境”两者之间如何平衡,从而一窥余先生的治

学境界。

六、中国近世思想史的脉络与特质。余先生提出了新儒家的思想突破属于唐宋思想整体“入世转向”的精神运动的论说,系统而完整地梳理了由新禅宗发起、新儒家继续,新道教最终卷入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脉络上,新儒家完成了形而上的义理建构,但入世的宗旨终在“经世”,由此又形成新儒家的政治文化。基于这样的梳理,彰显出近世思想的人世情怀、理性精神与主体意识。□

新书介绍

- 《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复旦文史丛刊”第三种)



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是礼仪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说,丧礼在 17 世纪中欧交流中的角色。选择礼仪作为视角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往对中西交往,尤其是对 17 世纪中国天主教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宗教教义和西方科学,而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礼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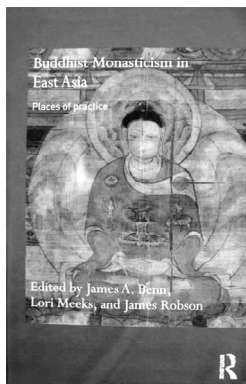
却被忽略了。本书的研究得益于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这期间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一种基本是传教学和欧洲中心的立场,转变为一种汉学和中国中心的路数。对礼仪的关注推动以上转变,也使得我们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的研究,而代之以一种关注文化互动的新范式。

本书只关注一种礼仪——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具体来说说是丧葬礼,因为它通常被认为处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之后,葬礼发生了何种变化? 本书将研究的时段限定在 17 世纪,主要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葬礼的材料大量地保存了下来。限定时间框架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本书并不把已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礼仪之争”作为重点。因为单单是葬礼之类的礼仪本身

就值得研究,不必从“礼仪之争”的角度来解读,虽然 1690 年代之前的有关中国葬礼的文献已经受到这场争论的影响。“礼仪之争”只是本书研究的边缘问题,但由礼仪问题而引发的紧张,还是要放在这场显示了中西礼仪活动特质的争论的背景下来考虑。最后,这一时期有几个典型特色,使得它特别适合从文化碰撞的角度进行观察。

文史研究院“复旦文史丛刊”第三种,比利时鲁汶大学汉学系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著、张佳译《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9 月出版。

- 《东亚佛教的隐修:对佛寺的考察》(*Buddhist Monasticism in East Asia: Places of Practice*)



佛教隐修一直是佛学研究 and 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然而,如何阐释隐修的场所,即佛教寺院,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性质和功能,依然是争论的焦点。本书即从宗教、社会、文化、艺术与政治等多个角度,讨论中古时期中国和日本佛教寺院的作用,并试图揭示佛教寺院在其实体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多样性。主要讨论了僧侣与普通信众的关系,出家戒律的意义,具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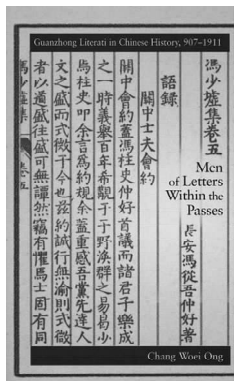
佛寺的运作,以及都城和地方寺院之间的差异。旨在说明,中古时期东亚的佛教寺院,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作出家人远离尘世喧嚣和诱惑,群体隐修的场所。

该书收录了领域内一流学者的七篇学术论文,包括 James Robson 的序言《不远不近:中古中国与日本佛教寺院的历史和文化情境》,篠原光一《中国佛教律文中关于在信徒家用斋之惯例的演变》,James Robson《寺院空间与圣迹:中国佛教僧传的几个面相》,汪悦进《佛寺空间构造中的图像:从洛阳敬爱寺到敦煌第217号窟》,T. H. Barrett《从跨文化的视角看禅诗中猫的意象》,William Bodiford《僧侣眼中的中古日本佛寺》,Lori Meeks《众人之愿:叡尊与前近代日本受戒会的盛行》,及 Paul Groner《兴圆与日本天台宗的授戒灌顶仪式》等。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在探求佛教宗教生活的这一核心面相,此书正是朝着这一方面所做的尝试,对于佛学研究、亚洲研究及东亚宗教等研究领域将有所启示。

James A. Benn, Lori Meeks, James Robson 合编《东亚佛教的隐修:对佛寺的考察》,Routledge 出版公司 2009 年 9 月出版。

• 《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Men of Letters within the Passes: Guanzhong Literati in Chinese History, 907-1911*)



郝若贝 (Robert M. Hartwell) 指出,经过十一世纪的发展,宋初以来支配了朝廷政治的职业精英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逐渐与地方士绅趋近,到了南宋,彻底让位于后者。他的学生韩明士 (Robert P. Hymes) 通过江西抚州的个案研究,证实了这一看法。他的研究表明,北宋的精

英以任职朝廷为终极的职业目标,热衷于通过婚姻等形式建立全国性的社会网络,而南宋的精英采取了地方化的发展策略,加强了地方的婚姻联系,还将婚配对象扩展到了非官僚家庭。在韩明士之后,精英的地方化成为欧美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命题,但是其他学者后继的研究集中在南方,北方的情况一直缺乏关注,特别是南方与北方是否存在差异,金元时期异族的入住给地方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等问题,尚无人解答,这正是作者在专著中要深入探究的。

该书通过考察十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关中士人的历史,理清了他们是如何将下列三组关系概念化的:中央与区域 (central/regional), 官方与非官方 (official/unofficial)、全国与地方 (national/local)。关中士人共同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在营造地方认同和非官方空间的作用,也得到了清晰的阐述。

作者分三个时间段来研究近一千年关中士人的历史——五代北宋时期、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帝制国家对关中士人历史意识的阐释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们对上述三组关系的认识在这三个时期也很不一样。在五代和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中士人以让朝廷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为荣,并且让朝廷来决定地方事务。然而,当王安石推行新法以扩张朝廷势力的时候,在关中遭到了张载等人的抵制,他们开始关心如何将国家、精英家族和社会整合起来。北宋的统治结束后,关中处于金元的统治之下,士人文化的发展中断,与其他阶层相比,士人未占有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优势。到了明代,受惠于国家政策,关中出现了一批大家族和具有全国影响的学者、官员。明清的易代,没有造成关中文化的断裂,很多士人家族也得以存续下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昌伟著《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2008 年 12 月出版。□

外刊撷英

- 《再析应璩及其对于陶潜诗歌之影响》(*Rediscovering Ying Qu and His Poetic Relationship to Tao Qian*) Pauline L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9:No. 1, June, 2009

应璩是建安时期最为著名的文学家与书法家之一,也是当时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文章以为,到了晚近时期,学人对于应璩的看法就与其在建安时期的形象有所不同。应璩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应场的弟弟,人们要么认为他是建安时期一流的尺牍作家,要么是受钟嵘《诗品》的影响视其为陶潜诗歌的渊源所在。尤其是后者,自宋人强调之后,晚近以来学人介绍这位“鲜为人知”的诗人时,往往就借用钟嵘的评述。文章指出,有关应璩的留存史料的缺乏,是检讨钟嵘说法的最大障碍,过去学人过于依赖通过对《百一诗》的分析去考察应璩的诗歌模式。文章则别辟新路,运用保存相对较为完整,同时也是应璩在建安时期更为享誉的散文,加上对于尺牍、诗歌的分析,重估应璩的作品,重新检讨钟嵘《诗品》有关陶潜诗歌渊源于应璩的陈说。

- 《清代的性别与文本政治:以〈国朝闺秀正始集〉为例》(*Gender and Textual Politic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e Case of the Zhengshiji*) Xiao Rong L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9: No. 1, June, 2009

《国朝闺秀正始集》由清代女诗人、学者恽珠编

纂,道光年间刊刻。《正始集》作为清代女性文学运动成熟、繁荣的重要标志,融汇了1500多位女诗人的3000多首诗歌,可称是自清初直至道光时期近两百年间女诗人作品的大总结。《正始集》反映了在其尚未刊刻之前即已存在的一种趋势:男女诗人并存的结集。此次结集进而纯粹为女性诗人作品的汇集。此外,通过考查《正始集》编纂时期清代文学的背景,文章试图揭示女性与文学权力和话语的联系。文章指出,《正始集》编纂时期有着良好的文学氛围,此时女诗人、女学者们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学声音和寻求女性文学的正当性,更在于建立她们对于文学范式及其操作的权威。文章通过分析《正始集》编纂的理论、操作原则,认为《正始集》女编者的雄心抱负浓缩在本集的标题中,“正始”透露出,编者欲着力构建从《诗经》而来的女性诗歌的道德性、艺术性“正统”,意图寻求女性诗歌在男性主导社会中的位置。这已远远超出之前的结集建立女性诗歌规范,或者提升女性文学水准的意图。

- 《印度戒律与中国早期的律宗大师:佛教的一个现实》(*Indian Disciplinary Rules and Their Early Chinese Adepts: A Buddhist Reality*) Ann Heirm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28: No. 2, 2008

文章旨在考察5至8世纪中国律宗繁盛时期,中



国佛教大师对于引入印度戒律,并使之符合中国现实时所采取的不同方式与态度,由此显现出革新与变通的过程,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律宗发展历史的理解。文章首先考查了中国寺庙中早期清规戒律的接受、发展过程,并着重描述了道宣、义净这两位律宗大师在戒律翻译、运用上的不同态度。道宣作为南山律宗的开创者,促进了戒律在中国寺院中的发展。作为西明寺的住持,道宣创作了一些极具影响的律宗解说,并积极地 将佛教推广进朝廷。义净以撰写《南海寄归内法传》闻名,其西行印度那烂陀寺参行,翻译了众多律部书籍。文章第二部分关注印度戒律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即略教时期,并认为,同一佛教大师接受、实施戒律的态度往往随着中国佛教寺院的现实情况的不同而变化,他们在翻译印度戒律时往往不如其对外宣称的那么严格,尽管这一实用主义作法也受到各种限制。

- 《从顾起元〈客座赘语〉看明太祖有关酷律严刑的“诏令”》(Ming Taizu's "Placards" on Harsh Regulations and Punishment Revealed in Gu Qiyuan's *Kezuo zhuiyu*) Hok-Lan Chan, *Asia Major*, Vol. 22: Part 1, 2009

文章通过顾起元《客座赘语》一书的记载与描述,试图显现朱元璋时代严刑酷律的面貌,以及其中的曲折发展与意味。明太祖出身卑微,通过十多年南征北战,最终击败元朝统治者及各地军阀,获取政权。鉴于蒙元政府统治下松懈的律法,在内外压力之下,明太祖迫切希望通过确定常规的法律准则来改变蒙元以来不利的局面。最终他成功地制定了由司法审判的官僚体系以及严刑酷律所支撑的法律体系。明太祖所制定的法律体系,对于皇族以及庶民一视同仁,最终希望通过严酷而又公正的刑法,去消减建国初期的犯罪与腐败,最终提升社会道德,并通过这个途径,建立一个服从于其个人权威的社会政治秩序。

- 《随黄河而变:1048-1128 年间的河北环境史》(Changing with the Yellow Riv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Hebei, 1048-1128) Ling Zh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9: No. 1, June, 2009

之前的学者对于宋代河北环境史的关注远弱于于此间经济唐宋转型的大探讨,基于对 700—1200 年间中国南方地区发展经验的考察,历史学家们看到了宋代经济的积极进展,往往使用诸如“中古经济大变革”一类的词语。文章并不否认这类基于中国南方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只是试图解释引起河北传统农业经济大衰退的原因,也就是历次黄河泛滥对于河北自然环境的影响。文章着重讨论了从 1048 年黄河大决堤引起的黄河大泛滥开始,到 1128 年间所发生的历次黄河水泛滥的频率、分布的区域及其模式,分析洪水在短期间与长期间对于土地盐碱化、沙漠化、植被减少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发现,河北当地水资源在水灾期间所遭受的重大破坏给河北地区带来长时期的经济衰退,为研究唐宋之间经济重心南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 《近世琉球社会的真言宗寺院与占卦》(近世琉球社会における真言宗寺院と占い) 下郡刚,东方宗教, 第一百十二辑,2009 年

十九世纪中叶出身琉球久米岛具志川(位于冲绳岛中部)地方官吏世家的上江洲亲云上(琉球官吏位阶之一)智俊,以及比他早约半个世纪的琉球都城首里官员伊江亲方朝睦经常出入寺院求签问卦。文章通过整理现存上江洲家占卦文书中的百番签,指出智俊经常出入位于那霸的西福寺。西福寺是琉球的一座私寺,为求生存往往接受琉球民间的祈愿,也从事占卦活动。而朝睦虽是居住于临济宗寺院云集的王城首里的官员,却同样到那霸的真言宗私寺善兴寺求签问卦。值得注意的是,以西福寺为中心的真言宗寺院使用纯汉文的“观音灵签”。作者指出观音灵签之所以在真言宗寺院被广泛使用,是因为以航海为主业的琉球民间社会已经普遍接受关乎航海安全的观音信仰。一方面,十六世纪日本僧人日秀上人自熊野那智浦渡海至琉球,建立真言宗第一大寺护国寺以来,琉球的观音信仰与日本的熊野信仰就密切结合在一起,具备了保护航海安全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伴随琉球王国十七世



纪以来的中国化政策,真言宗寺院从中国直接引入观音灵签,无疑也进一步加强了其社会功能。

• 《关于西洋航行的朱印状》(西洋渡航朱印状について)中岛楽章,东方学,第百十七辑,2009 年

十七世纪初,朱印船贸易早期,德川幕府共向西日本的大名和外国商人发放前往西洋的二十道朱印状。关于西洋所指的地域,尽管自江户时代后期就有许多学者进行探讨,但迄今并未达成一致结论。川岛元次郎和岩生成一认为朱印状中的“西洋”是指澳门,而中村质则主张“西洋”是指包括菲律宾在内的整个东南亚,但是双方的论据都难以令人信服。文章发掘了同时代史料中记载西洋确切地域的例子,并认为朱印状中的西洋主要是指东南亚大陆的港口,有时也指南中国沿海港口。在朱印船贸易早期,德川幕府主要向外国商人发放前往西洋的朱印状,允许他们自由前往东南亚大陆和南中国的诸多港口。后来随着对外贸易制度的巩固,德川幕府对大名的对外贸易加强了控制,前往西洋的朱印状最终在 1608 年停止签发。

• 《关于对马宗家旧藏的元刊本〈事林广记〉》(对马宗家旧蔵の元刊本の『事林広記』について)宫纪子,东洋史研究,第六十七卷,第一号,2008 年

对马岛位于朝鲜半岛与日本九州之间,在日本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的贸易和外交事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统治对马岛长达六百余年的宗家藏有一部元刊本《事林广记》,长期以来不为人知。此书是在南宋末年福建建安人陈元靓《博闻录》基础上增订的一部日用百科全书,绘有丰富插图并加入了蒙元时代的信息。后来,此书在高丽和室町幕府的僧侣、王族和贵族阶层中广泛传阅,无疑有助于培育一种跨越时空的共同文化。《事林广记》在日本有数个版本被发现,在日本古代僧侣和贵族讲习汉文的教科书中也屡屡提到。从宗家藏《事林广记》上所见收藏印文判断,它似乎曾被一名僧人携至京都五山寺院之一的相国寺,这名僧人曾因外交事务或作为学问僧入元。进入江户时代,一位掌管对朝鲜外交事务的日本僧人似曾用过该书并将其携至对马岛。该书印刷精确,并配有大量插

图,因此在出版史上也特别值得关注。此外,该版本中的一些插图与关于南宋和金朝职官以及忽必烈统治时期地方制度的记述,也不见于现存其它版本,这些无疑对于解决《事林广记》成书和增订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 《尹根寿与陆光祖——中朝之间的朱陆论难》(尹根寿と陆光祖——中朝間の朱陆问答)中纯夫,东洋史研究,第六十七卷,第三号,2008 年

嘉靖四十五年(朝鲜明宗二十一年,1566)以赴燕使身份赴北京的尹根寿与明朝官员陆光祖围绕朱子学与阳明学发生争论,争论内容被载入尹根寿的文集《月汀集》“朱陆论难”一章。尹根寿坚决维护朱子学并抨击阳明学,而陆光祖则持相反立场。在宣祖统治时期的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期间,既有自明朝前往朝鲜的人员卷入朱陆或朱王之争,也有朝鲜人至明朝与明方人员发生类似争执。但是,《月汀集》“朱陆论难”不仅详细、深入地记载了中朝两国的第一次朱陆之争,并且它紧随朝鲜阳明学最早的批判者之一李滉之后,其史料意义不言而喻。此外,陆光祖作为位至吏部尚书的明朝高官,是明朝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其思想却鲜被提及。其文集《陆庄简公遗稿》保留了他与佛教及阳明学关系的片段记载,而至于他本人是否真正信奉阳明学则语焉不详。通过朝鲜史料所记“朱陆论难”,使阐明陆光祖的思想立场成为可能。

• 《杨守敬与小岛家——古医籍的收集与校勘》(杨守敬と小島家——古医籍の蒐集と校刊)真柳诚,东方学报,第八十三册,2008 年

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赴日期间(1880-1884),在考证医学派学者森立之(1807-1885)的帮助下收集了大量善本医书,并在日本编纂出版了《古逸丛书》。归国之后,杨守敬继续其医书出版活动。然而,迄今为止关于他的医书出版活动及其整体背景的研究并不充分。杨守敬所付梓的医书主要有《聿修堂医学丛书》(1884)、宋版《脉经》(1893)、《武昌医馆丛书》(1904-1912)。此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809 种医书中有 451 种来自杨守敬的杨氏观海堂。并且,杨守



敬所藏医书大部分来自日本江户幕府医官世家小島家族的旧藏。小島尚质及其二子尚真、尚綱致力于善本古医书的收藏及校勘,杨守敬于1890年访日之际,正值小島家族的最后成员尚綱辞世,其家藏遂为杨守敬所有。也就是说,杨守敬归国之后所付梓的医书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江户末期以小島家族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古典医籍文献学上的成就。

- 《金元时代华北外来民族的儒学修习及其动因——以蒙古时代华北驻屯军所属家族的事例为中心》(金元时代华北における外来民族の儒学习得とその契機——モンゴル时代华北驻屯军所属家系の事例を中心に) 饭山知保,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五十九集,2007年

文章以现存元代西夏遗民文献《述善集》的记载为中心,考察了驻屯河南开州濮阳县的探马赤军户唐兀台家族以及其它驻屯军家族修习儒学的情况,并试

图探求这一现象在金元时期华北社会演进中的定位。八世纪直至北宋中后期,晋北等地的沙陀、粟特、突厥家族末裔为历代中原王朝提供武力支持,并不以科举为进身之途。女真人征服华北之后,为夸示正统和笼络知识阶层,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并且由于女真的征服,晋北地区丧失了原有的军事要冲地位,修习儒学参加科举渐渐成为当地知识阶层确保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同时困于征伐而日益贫困化的中下层女真人也积极参与科举。进入蒙古统治时代,华北社会由于特殊户计的设定和吏员出职盛行,知识阶层的出仕途径多样化,修习儒学参与科举不再是获得官职的唯一途径。然而,伴随元朝重开科举和完善学校制度,原本以征伐起家的探马赤军户竟也偃武修文,出现积极修习儒学的家族,这点十分耐人寻味并值得深入探讨。□

於梅舫、陈波 摘

倭寇之乱下明代士人对日本的研究

 朱莉丽

明代的中日关系几乎与倭寇问题共始终,尤其到嘉靖朝,倭寇对中国的侵扰达到了顶端,而中国人对日本的专门性研究,也正是肇始于这个时期。这时期的对日研究,先是从对日本国情和军事的分析入手,进而涉及日本民俗、文化、环境、历史等各个方面,经历了从浅显到深入,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通过介绍和分析成书于嘉靖、万历年间的《日本考略》、《日本图纂》、《日本一鉴》、《日本考》等研究日本的专书,试图从明代士人对日本列岛的印象、对倭寇问题的认识以及对日本人的认识的三个层面,解构明代知识分子眼中的日本图像。

明代士人对日本的研究,既对国人以往关注的领域有所继承,同时又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譬如关于日本列岛的基本情况,明代以前的一些正史著作中也屡有涉及,特别是唐代之前正史中关于日本的传,大都侧重于对日本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的介绍,其代表是《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而明代的日本研究在这方面远远超越了前代。比如对日本国家概况的介绍,明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可以通过自己收集到的信息和掌握的知识,来完成日本地图的绘制和地名的标注,这表明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和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而对日本风土人情的介绍更是明代日本研究成果中突出的一个方面,囊括了上至日本国家制度,下至百姓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成熟,是中国确立对日本的专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而

对日本语言的介绍除了具备文化上的意义,更为两国人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对倭寇问题的剖析和认识也是明代对日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既是明代对日研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方面,也是明代对日研究兴起的缘由。明代从事对日研究的知识分子从倭寇产生的原因开始,对倭寇在日本的分布和构成、入侵路线、中方处理倭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对明朝的抗倭工作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明代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则是一个更为错综复杂的问题,牵涉到个人的主观认识。由于明朝时除了倭寇,中日之间还存在着被明朝认可的、两国政府间的正式交往,以至于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分裂。产生于明代的日本人图像很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现象。彬彬有礼和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像交错在国人的脑海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与日本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总体而言,随着对日研究的展开和逐步深入,明代知识人的对日认识较之前代出现了大的跨步;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限制以及中日之间恶劣关系的影响,他们的对日认识仍存在着许多臆测、猜想以及感情化的东西,但这恰恰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人的情感和中日关系的特质提供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

朱莉丽 文史研究院博士后

古典文学形象的经典解读

——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刘兰芝形象为例

 李慧玲

在中国经学史上,《礼记》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文献,据学者研究,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礼议之时,就是小戴《礼记》公开发表之时,其实际的成书年代还早于此。由于《礼记》是囊括社会各项仪礼的百科全书,对当时社会有着深远影响,加上被统治阶层扶持认可,所以对当时主流意识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

一个时代的文学形象,尤其是那些有“感召力”的正面形象,都可以从当代的主流意识中找到刻画依据。而初创于汉代、以后又被不断充实的长篇叙事诗《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章培恒等学者认为,此诗发端于东汉建安年间,但其主要部分则完成于魏晋及南朝,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其女主人公刘兰芝文学形象的塑造,正是《礼记》对当时社会女性要求的缩影。在作品中,刘兰芝可爱和可悲形象的塑造,都能从《礼记》中找到理论根据:她的可爱,完全符合《礼记》对女性社会要求的标准,即女性的“四德”标准;而她的可悲,无论是被休回家、遭遇逼婚以及投水自尽,也无不渗透着《礼记》的影子。可以说,刘兰芝的文学形象就是按照《礼记》的相关内容来塑造的。

《礼记》何以具有此种文学形象的解读能力?这首先和《礼记》的内容有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所涉及的矛盾,属于日常生活中“礼”的问题,而三礼之

中,《周礼》主要是讲政府机构的设官分职,和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无关;《仪礼》虽然是讲十五种人生礼仪(如士冠礼、士昏礼等),但因为其僵化死板的风格而被世人抛弃;只有《礼记》,由于贴近实际生活,又包罗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为世人喜爱和接受。其次,又因为它维护尊卑上下的社会秩序,也备受朝廷的青睐和扶持。三国魏时,《礼记》入经,此后由于应试的需要,更促进了各阶层对它的学习。由于以上原因,《礼记》在社会各阶层都备受瞩目,也被统治阶级作为主流意识传扬发展,在日常生活甚至文学创作中,它无形中就成为人们心中的规范。具体到刘兰芝的文学形象就是如此。今人评价刘氏的命运,大多归咎于当时封建礼教和家长制度,这一观点虽然指出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忽略了《礼记》这部经典,所论都难免有失漏之憾。如果我们走出以今释古的思维,刘兰芝的遭遇都可以从《礼记》中找到理论上的依据。本文拟就《礼记》的具体内容以及它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方面,对经典中刘兰芝这一文学形象进行分析和解读。□

李慧玲 文史研究院博士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第三批项目立项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第三批项目于 2009 年 1 月 并经过公示后,其中七个项目确定立项。具体如下。
公开招标,共收到十三份申报项目书。经过专家评审,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课 题
1	芮传明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吐鲁番摩尼教非汉语文书研究
2	马小鹤	哈佛燕京图书馆	从死海古卷到敦煌遗书
3	李星明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
4	刘 震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以“出家经”为范畴的佛陀“前传”研究
5	孙英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批判的理解国际中国学
6	王鑫磊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1881—1883 年朝鲜的“选学赴津”活动
7	张 翔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中国”、“中华”的实体和理念——日本德川·明治初期的东亚认识

以下为第三批立项项目的内容概述:

吐鲁番摩尼教非汉语文书研究

由摩尼教徒自己撰写的大量“真正的”摩尼教文书,见于 1902—1914 年德国考察队在吐鲁番的四次发掘中获得的资料。文书涉及了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和突厥语等东方语言,并且正是因为成书于重要的“丝绸之路”上,故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大价值不言而喻。本课题以摩尼教东传过程中所受的佛教影响为研究重点,有利于釐清东传摩尼教演变的情况,以及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亦即是说,对于探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交流、融合的细节和真相,有着很大助益。

从死海古卷到敦煌遗书

这一课题将探讨至今甚少为人所注意的中外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线索:死海古卷中的《巨人书》(*The Book of the Giants*)与敦煌遗书中的《摩尼教残经一》之间的联系。《摩尼教残经一》的写卷目前藏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刊布于近年来正在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东方的敦煌发现大批遗书之后四十余年,在西方远隔万里的死海岸边,发现了另一批抄本,就是著名的死海古卷,其中有一种是《巨人书》。本课题将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从死海古卷《巨人书》到敦煌遗书《摩尼教残经一》的传播环节。这条文化传播线索将证明,古代中国与西



方的思想文化联系远比一般想象的深刻。

隋唐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

这一课题的研究内容是隋唐时期墓葬艺术中的佛教文化因素。其意义在于从图像艺术角度较全面地探讨外来的佛教思想观念对隋唐时期中国传统丧葬观念和丧葬礼仪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阐释中国本土丧葬艺术对佛教艺术的吸纳融合状况。此项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思想史、宗教史与艺术史的综合研究,拓展中国艺术史研究的维度。

以“出家经”为范畴的佛陀“前传”研究

佛陀传记产生于不同时期、地域及语言环境、部派,而且文本间具有错综复杂的继承关系。这样就造成了同一位宗教创始人的内容、风格、篇幅迥异的生平。在佛教的起源之地已经有了所谓的“集经”,而在佛教接受之地当然也有对应的作品。这些作品归根结蒂还是不会脱离古代作品的模式,称不上是一种对佛陀传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而在僧祐、道宣之后,中国有必要对西方雨后春笋般的佛传编写和研究在学术层面上作出回应。研究佛传的形成也就是研究宗教思想史,不仅可以得出宗教人物传记的创作规律,也可发现其隐藏的历史背景以及原因和方法。

批判的理解国际中国学

海外中国学对中国历史之研究,大部分仍然要纳入外国历史学或者其他学科的发展潮流和思路,有自己特殊的语境(context)。中国学者虽然热衷于用西方之理论条理中国之史事,但是却往往忽略西方中国学自身理论潮流的缘起及背景,在大的西方学术框架下,这些理论创新到底是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我们大

多会加以忽略。因此很多研究随意将西方理论概念拿来解释中国历史现象,从而产生第二次的误读。此研究着眼于还原西方中国学的重要学术潮流在自己学术长河中的位置和角色,注重于概念在不同学术体系中的流转和重新阐发,揭示西方中国学提出这些概念的时代背景,进而对国内的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有所启发和裨益。

1881—1883年朝鲜的“选学赴津”活动

19世纪晚期,朝鲜向晚清政府派出一支使者队伍,目的是学习西学。同时,朝鲜官员金允植在逗留天津期间,和中国的一些重要官员如李鸿章、马建忠、袁世凯等多次进行秘密会谈,内容涉及朝鲜如何应对西方要求其开港的压力以及日本的威胁等。朝鲜在感受到西方压力之后求西学于中国,对中国于西学的态度、接受的程度乃至自身科技发展水平有一个清晰的观察,实际上就涉及晚清政府和士人对于西学的回应。两国官员间的秘密会谈,大量内容涉及中国官员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分析,包括对东西方关系、中日韩三国关系的理解和应对,对转换视角来探讨晚清中外关系史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中华”的实体和理念——日本德川·明治初期的东亚认识

此课题将考察江户时代和明治初期日本学人对传统“中国”的定义和定位中,展现的对东亚大陆以及日本的一种自他认识,其中包括对日本学人当时长期关注的“华夷内外”、“禅让·征伐”等一系列问题作概要的考察。并进而探讨德川时代和明治初期,日本学人的自他认识对东亚历史上各国、各区域共同问题的解决和不同道路的选择的影响及意义。□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专职、访问研究人员招聘启事

● 专职全聘研究人员

招聘岗位 专职全聘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 东亚跨区域历史研究,中国艺术、思想与文化史研究等。

招聘条件

1. 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并出版过专著;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 50 岁以下;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2. 副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 40 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学术与科研道德。

3. 助理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与较强的研究能力;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 35 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品德、学术与科研道德。

招聘范围 国内、国外

岗位待遇 以全聘的方式,作为复旦大学教职员工直接进入文史研究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相关

待遇按照《复旦大学“985 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人力资源配置管理实施方案补充条款》(新版)执行。

应聘程序

1.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包括:a. 本人简历,含 2 寸报名照一张;b.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c. 目前任职证明复印件;d. 重要著作和论文复印件,著作有目录和版权页即可,论文则须有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与正文,两者最好能含被收录引用等情况的说明;e. 重要获奖证明复印件。

2. 研究院根据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安排面试。

3. 面试通过后报请学校最终决定。

● 访问研究人员

招聘岗位 全时、分时访问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 东亚跨区域历史研究,中国艺术、思想与文化史研究等。

招聘条件

1. 访问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并出版过专著;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 50 岁以下;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全时访问人员年工作时间 9 个

月以上;分时访问人员工作时间1个月以上。

2. 访问副研究员:

具有博士学位,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学术功底;已在核心和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若干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掌握一门以上外语;年龄在40岁以下;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学术与科研道德。全时访问人员年工作时间9个月以上;分时访问人员工作时间1个月以上。

招聘范围 国内,国外

岗位待遇 相关待遇按照《复旦大学“985工程”二期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人力资源配置管理实施方案补充条款》(新版)执行。

应聘程序

1.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包括:a. 复旦大学“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访问学者申请表,可在我院网站下载;b. 本人简历,含2寸报名照一张;c. 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d. 目前任职证明复印件;e. 重要著

作和论文复印件,著作有目录和版权页即可,论文则须有发表刊物的封面、目录与正文,两者最好能含被收录引用等情况的说明;f. 重要获奖证明复印件。

2. 研究院根据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安排面试。

3. 面试通过后报请学校最终决定。

截止日期 应聘全职研究人员,请于2010年6月30日前寄送材料;应聘访问学者,请于2009年12月31日前寄送材料。

联系人 金秀英

电话/传真 (86) 21—5566 5284

材料寄送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200433

电子信箱 wsyjj@fudan.edu.cn

网 址 www.iahs.fudan.edu.cn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09.07—2009.09)

- 2009年7月2日

葛兆光教授赴台湾高雄参加千佛山文教基金会组织的“佛教经典传播与义理讨论会”，并发表主题演讲，题为《晚清唯识典籍从日本反传中国的影响》。

- 2009年7月10日

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赴杭州为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作题为《为什么“赛先生”中文叫做“科学”？》的讲演。

- 2009年7月11日

访问学者杜春媚博士结束在我院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完成题为《西方关于中国的想象：二十世纪初西方关于中国的畅销伪书》的学术论文。

同日，双聘研究员韩昇教授在日本成城学园大学举办的出土文献研究会上作题为《新出土的阴云墓志研究》的学术报告。

- 2009年7月14日

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历史所博士候选人杨俊峰结束在我院两个月的学术访问，完成了题为《赐封与劝忠：两宋之际的旌忠庙》的学术论文。

- 2009年7月16日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参加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会主办的“两岸朱子学与当代社会伦理研讨会”，并发表题为《对“内圣外王”的一种新诠释——就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而谈》的学术论文。

表题为《对“内圣外王”的一种新诠释——就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而谈》的学术论文。

- 2009年7月17日

葛兆光教授在北京参加中华书局举行的“中华学术丛书”第一次学术委员会议。参会人员还包括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荣新江教授、唐晓峰教授、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王汎森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等。

- 2009年7月19—28日

董少新副研究员就科研项目“何大化《远方亚洲》译注与研究”赴厦门、泉州、福州等地考察当地保存的景教、也里可温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历史遗存。

- 2009年7月25日

双聘研究员韩昇教授在日本专修大学作题为《关于井真成墓志》的学术报告。该报告后又于9月10日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井真成墓志再探讨》为题与参会专家讨论。

- 2009年7月26—27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主办的“第四届传统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题为《明清“西学”与“汉文西学经典”刍议》的学术论文。

- 2009年7月29日



我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校东亚学院就合作编撰出版《韩国汉文燕行录选编》一事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谈。参会的韩方代表有:辛承云教授、陈在教教授、安大会教授、金庆浩教授,我方葛兆光教授、双聘研究员陈正宏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孙晶、韩结根两位编审。双方就选目、底本、提要撰写及出版日程等事宜达成初步意向。

• 2009 年 7 月 31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基地合办的“东亚水泥产业发展国际论坛Ⅱ:中国水泥产业的过去与现在”国际研讨会,提交题为《“CEMENT”的汉译与晚清水泥技术知识在中国的译介》的论文。

• 2009 年 7 月

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特聘长江讲座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在光华楼为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了“经学与明清学术思想史”阅读研讨班。

• 2009 年 8 月 1—2 日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传统与现代:从明清到民国的转变”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题为《从“宋明”到“明清”——就儒学与宗教的关系看明清思想的连续性》的论文。

• 2009 年 8 月 6 日

双聘研究员韩昇教授在日本长野举办的学术会议上作题为《周隋王朝交替之际的知识官员》的学术报告。

• 2009 年 8 月 15 日

葛兆光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为上海书展作“明镜与风幡:我读坛经”的演讲,并接受新浪图书频道的采访。

同日,《文汇报》发表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所作题为《唐代文学的魅力》的报告。

• 2009 年 8 月 15—18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主办的“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题为《〈七

奇图说〉与清人视野中的“天下七奇”》的学术论文。

• 2009 年 8 月 22—24 日

葛兆光教授参加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委员会 2009 年度项目评审会议。

• 2009 年 8 月 25 日

我院新引进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孙英刚博士及新加坡国立大学朱溢博士正式报到。

• 2009 年 8 月 26 日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芮传明研究员来我院开始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并就筹建“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与我院人员会谈。

同日,葛兆光教授应哈佛燕京学社邀请,赴美国进行一个月的学术访问。

• 2009 年 8 月

双聘研究员吴震教授的专著《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作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第 83 册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此书也是作者承担的 2007 年度复旦大学“985 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文史研究院研究项目的成果。

• 2009 年 9 月 1 日

浙江大学哲学系何俊教授来我院开始为期四个月的学术访问,访问课题为“叶水心学述”。

• 2009 年 9 月 3—5 日

许全胜副研究员赴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出席“敦煌学:第二个百年研究视角与问题”国际学术会议,并提交题为《新出吐鲁番文书的若干问题》的学术论文。

• 2009 年 9 月 5 日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赴西北师范大学参加《新编全上古三代两汉三国六朝文》编纂研讨会,并于 7 日在该校文学院作题为《文史学术前沿之我见》的讲座。

• 2009 年 9 月 9—11 日

李星明研究员参加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中心合办的“中国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发表题为《隋唐墓葬艺术中的



佛教文化因素——以唐陵神道石柱为例》的学术论文。

• 2009 年 9 月 11 日

我院博士后李慧玲为第十二期“博士后论坛”课题为《古典文学形象的经典解读——以〈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刘兰芝形象为例》的报告。

• 2009 年 9 月 15 日

德国哥廷根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施耐德 (Axel Schneider) 教授来访, 商议即将于年底与我院合办的“民族认同与历史意识: 审视近现代日本与中国的历史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相关事宜, 院长助理王鑫磊、金秀英接待。

下午, 我院举办第十二次小型学术研究会, 围绕董少新副研究员所作的题为《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的报告展开讨论, 中外交流史专家、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审徐文堪先生主持。

• 2009 年 9 月 17—21 日

刘震副研究员参加中山大学人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佛教与东亚思想传统”国际研讨会, 并提交题为《从〈长阿含·修身经〉的文义分析来看佛教对苦行观念的演变》的学术论文。

• 2009 年 9 月 21 日

葛兆光教授访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 拜会系主任韩明士 (Robert Hymes) 教授, 并作题为《从周边文献看中国》的学术报告, 该系商伟教授主持。

• 2009 年 9 月 25—30 日

董少新副研究员赴珠海、广州参加“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 并提交题为《澳门与南明各朝之关系》的学术论文。

• 2009 年 9 月 25—27 日

双聘研究员陈尚君教授参加台湾大学主办的“文化视域的融合——第九届唐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提交题为《唐女诗人甄辨》的学术论文。

• 2009 年 9 月 26—27 日

双聘研究员邹振环教授参加珠海市委宣传部、澳门基金会、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首届珠海文化论坛: “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 提交题为《黄胜及其〈火器略说〉》的论文。

• 2009 年 9 月 26—28 日

许全胜副研究员赴云南蒙自参加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 以对外开放为中心”学术研讨会, 提交题为《云南三碑合证》的学术论文。

• 2009 年 9 月 28 日

葛兆光教授应包弼德 (Peter K. Bol) 教授邀请, 在哈佛大学东亚系与该系研究生就“如何研究宋代思想史”的主题进行讨论。

• 2009 年 9 月 29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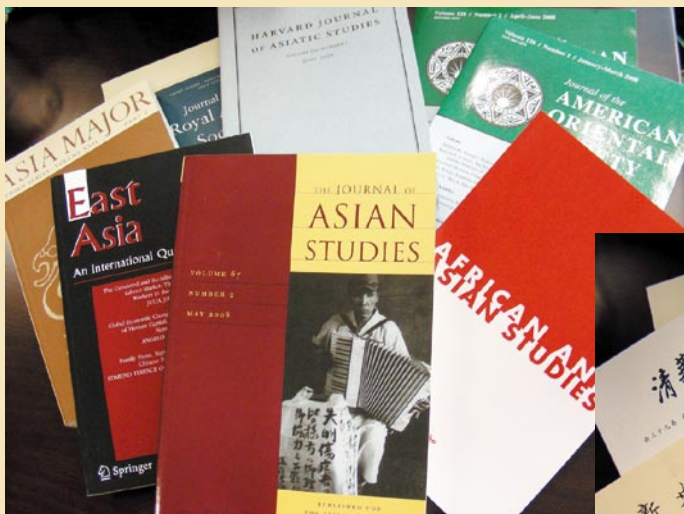
我院举办第十三次小型学术研究会, 访问学者、浙江大学哲学系何俊教授作题为《余英时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的报告, 双聘研究员徐洪兴教授主持。

• 2009 年 9 月

刘震副研究员的论文《从百颂体〈弥勒授记经〉来看中印及周边的文化交流》在《复旦学报》2009 年第 5 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发表。

葛兆光教授的论文《国家与历史之间——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在《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发表。

葛兆光教授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教学与研究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评选为 2009—2010 年度, 也是第一届“普林斯顿国际学人” (Princeton Global Scholar), 在今后三至五年中, 将作为客座教授, 每年在该校东亚系为研究生开设六周的研究课程。该委员会同时表示希望以此为契机, 加强复旦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两校间的合作。□



九月，我院资料室订购的 2009 年上半年境外期刊陆续上架，计十五种。截至目前，资料室收藏的英文、日文期刊总计三十余种。



九月，资料室购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全六编五十册，包括 1928 至 2000 年间《集刊》所收全部论文，按现代学科分类整理。



日本创价大学辛嶋静志教授向我院资料室赠送《中亚佛教写本：大英博物馆藏梵文残卷》、《妙法莲华经词典》等书共 25 册。

封面题字 秦绍德

编 辑 杨 琴 肖 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 21 55665284

邮 箱 wsyjj@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